

【“百年邓小平”丛书】

Z 中学生读本
OU JIN WEI REN

本书编写组编



走近伟人

——邓小平的人生轨迹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Encyclopedia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

“百年邓小平”丛书·中学生读本

走近伟人

——邓小平的人生轨迹

本书编写组 编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总编辑：徐惟诚 社长：田胜立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走近伟人：邓小平的人生轨迹/本书编写组编. —北京：中国
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4.7

(百年邓小平)

ISBN 7-5000-7118-3

I. 走… II. 本… III. 邓小平 (1904~1997) —生平事迹
—青少年读物 IV. A76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68704 号

丛书策划：陈明生 陈 玫

责任编辑：严 峻

责任印制：王丽荣

封面设计：何 茜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邮政编码：100037 电话：010-68315606)

<http://www.ecph.com.cn>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排版

北京顺义振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5.5 字数：135 千字

2004 年 7 月第 1 版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7-5000-7118-3 / G·761

定价：6.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早年邓小平	(1)
	广安子弟	(2)
	留法岁月	(4)
	莫斯科的洗礼	(11)
第二章	戎马生涯中的邓小平	(15)
	百色起义	(17)
	在抗日的战场上	(20)
	千里跃进大别山	(24)
	从淮海大战到渡江战役	(32)
第三章	政坛上的邓小平	(37)
	出使莫斯科	(39)
	在江西的日子里	(47)
	在历史的转折关头	(53)
第四章	开创伟业的邓小平	(63)
	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	(65)
	科教兴国	(72)

百万大裁军	(77)
开创外交新局面	(80)
祖国统一大业	(92)
创办经济特区	(103)
主动退休	(111)
 第五章 南方视察中的邓小平	 (116)
 第六章 平凡生活中的邓小平	 (124)
邓小平的兴趣爱好	(125)
邓小平的情感世界	(131)
伟人的魅力	(148)
 第七章 伟人辞世	 (157)
 第八章 伟人身后	 (163)
 参考书目	 (170)
后记	(171)

第一章 早年邓小平

1904年8月22日，邓小平出生在四川省广安县协兴场姚坪里（今广安市协兴镇牌坊村）。原名邓先圣，5岁进私塾发蒙，学名邓希贤，后转入新式小学。高小毕业后，考入广安县立中学。1919年秋考入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受“五四”运动影响，这时的邓小平有了朴素的“工业救国”的爱国思想，他同全校同学一起参加抵制日货、声讨卖国贼的活动。1920年夏，赴法国勤工俭学。

邓小平到法国后，因生活所迫，只在中学学习



留法勤工俭学时的邓小平，时年16岁

了几个月，就先后到几个工厂做工，体验到生活的艰辛，体验到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当时，他和一批先进的中国留学生，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走上革命道路。1922年他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更名为旅欧中

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4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此，他走上无产阶级职业革命家的道路，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他担任过青年团旅欧总支部的领导成员和中共党组织里昂区的特派员。他还做过青年团旅欧总支部机关刊物《赤光》杂志的编辑。

1926年初，邓小平离法赴苏，先后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山大学学习。他在当时写的自传中说道：“我能留俄一天，便要努力研究一天，务使自己对于共产主义有一个相当的认识。”“我来莫的时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坚决地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

广安子弟

1904年8月22日，在四川省广安县协兴场姚坪里（今广安市协兴镇牌坊村）一个当地人称为“邓家老院子”的普通农家里，一个婴儿降生了。邓家老院子的主人邓绍昌为儿子取名为邓先圣，希望他长大后能有所成就。这个婴儿就是后来的邓小平。

邓小平5岁时被送入私塾发蒙，改名为邓希贤。当时私塾除教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之类幼学读物外，主要功课就是描红习字。塾师评定蒙童成绩优劣高下，就是看他诵背是否流畅，习字作业则以红笔圈或打×来区别。错写或结构不当的就在旁边划一个“×”，写得好的就画一个圈。蒙童互相之间常常以自己所得圈圈的多少来炫耀自夸。邓小平资质聪颖，悟性好，记忆力强。在先生教读后，他很快就能流利地诵背课文，深得先生的喜爱，常常被先生叫起来为其他同学示范领读。对描红习字，他更是一丝不苟，反复临摹练习。他的习字本上的红圈圈总是最多。邓小平的母亲每当看见放学归来的儿子又得了好些个红圈圈时，就照例地煮上一个鸡蛋以作奖励。

经过私塾写字课的严格训练，邓小平的书法有了良好的基

础。直到晚年他的字依然刚劲有力，这可以说是童年时代私塾学习的最大收益。

6岁时，邓小平离开私塾，进入了协兴场的北山小学读书。邓小平天资聪颖，读书勤奋用功，始终是班上成绩拔尖的优秀学生。

1918年，邓小平考入全县当时惟一的一所初级中学——广安县立中学。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长，邓小平的眼界逐渐打开。特别是在“五四”时代风潮的影响下，他不再满足于中学堂里“之乎者也”一类内容的学习，他渴望能学习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企求能掌握一门可以富国强民的实用技术。

1919年暑假，父亲邓绍昌从重庆回来，带来了重庆成立留法勤工俭学重庆分会，并准备开设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消息，他主张儿子中断中学学业去报考留法预备学校，将来以勤工俭学的方式去法国学习。邓绍昌做出这样一个不平凡的决定不是偶然的。他是在成都受过几年新式教育的有远见的知识分子，对军阀统治、教会横行不满，希望儿子到欧洲学点真本事，将来能够光耀门庭，报效社会和国家。对于父亲的意见，邓小平当时是十分高兴的，因为这与他科学救国、工业救国的想法是一致的。65年后，邓小平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我们感到中国衰弱，希望它强大起来，我们认为现代化是必由之路，所以我们到西方去求学。

1918年下半年，邓希贤和他的远房叔叔邓绍圣、同乡胡明德离开了广安，来到了重庆。

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是由当时重庆社会贤达人士倡议创办的，校址就在重庆市夫子祠内。它是当时这个西南重镇的最高学府，要想考进去是不容易的。但如同此前每次入学考试一样，邓小平这次也是一试中第，如愿地成为首期100多名学子中的一员。据邓小平当时的同学回忆，邓小平是稍晚才进入这所预

备学校的。他那时就显得非常精神，总是精力十分充沛，他的话不多，学习总是非常刻苦认真。

1919年北京爆发“五四”运动，消息传到重庆时已是5月中旬，但各界闻之依然热血沸腾。重庆以青年学生为主体举行了大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15岁的邓希贤和全校同学一起参加了这个运动。他们到卫戍司令部去示威请愿，坚持了两天一夜。回到学校后，还集体焚烧了日货。邓小平对此终身难忘。后来他回忆说，由于参加了这个运动，爱国救国的思想才能有所提高。15岁的邓小平，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已经具备了初步的爱国热情和进步思想。

经过一年的学习，首期学员中能顺利通过学校毕业考试及法国驻重庆领事馆口试和体格检查的，共有80多人。邓小平名列其中，而且是年龄最小的一名。这一年，他刚满16岁。

1920年8月27日，邓小平和80多名同学一道在重庆码头登上了“吉庆”轮，沿宜昌、汉口、九江一路顺水东下，最后抵达上海，乘法国邮船“盎特莱蓬”号驶出吴淞口，开始了他赴法求学的漫长旅程。

留法岁月

1920年10月19日，“盎特莱蓬”号邮船驶入法国南部的重要港口马赛，历时39天，行程3万余里，邓小平和他的同学们终于踏上了向往已久的法兰西的土地。

下船后，邓小平他们当即离开马赛，在华法教育会的安排下乘汽车直赴巴黎。巴黎这座被称为“世界花都”的西方大城市的繁华与气派，在这些初来乍到的中国勤工俭学学生的眼中充满了新鲜感和魅力，令他们惊叹不已。

等待中国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命运又会是怎样呢？

现实完全与勤工俭学学生美好的憧憬相反。

法国经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一段时期内保持了表面的繁荣，市场商品需求和劳动力就业状况是比较好的。但自1920年下半年起，一股资本主义经济的“寒潮”悄然降临了，整个法国经济呈现出萧条凋敝的局面。在这股寒流中，许多法国熟练工人都失去了工作岗位，无一技之长、语言又不通的中国学生又怎能找到工作呢？据粗略统计，1920年底，在法国的1000多名中国勤工俭学学生中，有70%没有工作。

在这样的背景下，1920年10月21日，邓小平和邓绍圣等20名同学来到距巴黎200多公里的小城巴耶，开始了在巴耶中学的学习生活。这是一所市立中学，学膳费相对低些。当时巴耶中学有4个班，即第一、第二、第三和第六班，其中第六班为附设的小学班，主要课程为法文、历史、算术、博物等。邓小平就在第六班补习法语。由于一天到晚生活在法国人中间，有较好的语言环境和较大的压力，所以经过不长时间，他的法语水平就有了明显提高。

尽管邓小平尽量节俭用度，但近5个月的学习生活费支出，已使他身上的钱所剩无几，他不得不离开巴耶中学，回到巴黎西郊华法教育会，希望得到一些资助或是帮忙介绍一份工作。令邓小平想不到的是，他从此再也没能进入法国学校。从1920年10月底到1921年3月，不过5个月的时间，邓小平就不得不结束了他在法国的学生生活。

就在邓小平于巴耶中学求学期间，中国留法勤工俭学发生了一个重大波折。1921年1月，被勤工俭学学生视为后盾的华法教育会先后发出两个通告，宣布从组织上和经济上与勤工俭学学生脱离关系，从3月15日起，华法教育会不再对失去工作、无法生活的勤工俭学学生发维持费。通告把学生推向了绝境。

绝望而又愤怒的勤工俭学学生再也无法沉默了，他们成立了

留法勤工俭学联合会，发起了“反饥饿运动”。2月28日上午8时许，400多名勤工俭学学生来到中国驻法公使馆请愿。公使馆找来的法国宪警冲入学生群中，毒打学生，强行抓走学生代表。一名学生因躲避警察毒打，被电车撞死。

“二二八”流血事件的发生，震动了法国。广大法国人民同情中国留学生的悲惨遭遇。法国政府一方面要顾及自己的面子，另一方面也怕严重伤害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会危害到法国在中国的利益。于是，法国政府出面与中国驻法公使馆磋商，决定由双方共同筹措一笔钱款，向失去工作的中国勤工俭学学生每人每天发5法郎的生活维持费，同时继续为失业学生介绍工作。

经华法教育会介绍，4月2日，邓小平和另外几名四川学生来到法国南部的重工业城市克鲁梭，进入施奈德钢铁厂做工。邓小平被分配在轧钢车间。他的工作是在达40度以上高温的车间里，在被钢水映红了的热蒸汽中，用长把铁钳挟着数十斤甚至百余斤重的火红炽热的钢材跑着拖离炉口，劳动强度大，而且极其危险。邓小平每周要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50多个小时，有时还要加夜班。

勤工俭学的学生住在离工厂20里地的盖沙南宿舍，二十几个人住一间大屋。宿舍设有食堂，可吃早晚二餐，中餐则只带面包在工厂吃，渴时饮点自来水，肉菜皆无。像邓小平这样每日只有10个法郎的学徒工，生活用度是十分拮据的。邓小平曾说过，他在克鲁梭拉红铁，做了一个月的苦工，挣的钱，连饭都吃不饱，还倒赔了100多法郎。

如果说体力上的劳累和生活上的困苦尚能忍受的话，那么法国工头的欺辱歧视则令邓小平和同学们无法忍受。在每天的工作中，工头像影子一样跟在周围，不允许工人们稍有休息。由于种种原因，在不到一个月內，做散工的勤工俭学学生日少一日，邓小平也无法再忍受下去，于4月23日离开了施奈德钢铁厂。这

样，邓小平到法国后最初的勤工实践，不到一个月即告结束了。短暂的劳工生活，使邓小平初次接触到了资本主义的黑暗面，亲身体验了劳工阶级受压迫受剥削的悲惨生活，在他本来十分单纯的头脑中，增加了许多从未有过的认识。

离开了克鲁梭，邓小平又回到巴黎的华法教育会，一边领取每天5法郎的维持费，一边等待继续做工的机会。在这样的环境下，邓小平度过了他17岁的生日。自1921年4月底到1922年2月，华法教育会一直是邓小平的栖身之地。

1921年6月，北洋军阀政府为扩大内战，派专使到巴黎，与法国政府秘商借款3亿法郎以购买军火。消息传出后，旅法华工、华侨及勤工俭学学生无不义愤填膺。周恩来、赵世炎、蔡和森等人联合旅法华人团体，组织了拒款委员会领导“拒款运动”。8月13日，在巴黎召开的第二次“拒款大会”上，中国公使馆秘书长遭到愤怒群众的痛打，迫使他在拒款宣言上签字，拒款斗争终于取得了重大胜利。留法学生的正义斗争，极大地触怒了法国北洋军阀政府和法国资产阶级政府。法国政府和中国驻法公使馆先后宣布停发中国勤工俭学学生的生活维持费。这样，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失工学生再一次面临生活的绝境。

为了生存，邓小平和同学们四处努力寻找工作，不论轻活、重活或脏活、累活，也不论杂工、临时工或清洁工，碰上什么干什么，所得收入也只能勉强充饥。这种没有着落的不稳定的状况持续了3个月。邓小平后来曾说：“每当我能买得起一块羊角面包和一杯牛奶时，我总是感到很高兴。”然而，这丁点食物与他身体生长高峰时期对营养的迫切需要来说却显得太少了。邓小平后来认为，他身材矮小，可能与青年时代在法国经常吃不饱有关。

自1922年起，法国经济开始复苏，一些工厂恢复开工，就业机会有所增加。邓小平先后又在几个工厂打零工。

就在这一年，邓小平开始了他人生道路上一个极为重大的转折。

中国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中有不少是在国内经受过“五四”爱国运动洗礼的先进分子，如赵世炎、蔡和森、周恩来、刘清扬、王若飞、李维汉、向警予等，他们带着振兴苦难的祖国的雄心壮志来到法国，却亲身感受了资本主义世界的黑暗现实，遭受了种种打击，他们“科学救国”的幻想破灭了。经过“二二八”运动、拒款运动，越来越多的勤工俭学学生擦亮了眼睛，接受了共产主义学说，走上革命道路。

1921年3月，赵世炎、张申府、刘清扬、周恩来等人秘密成立了巴黎共产主义小组。年底，赵世炎与在法国、德国和比利时的周恩来、李维汉、刘伯坚、王若飞、傅钟等频繁联系，商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事宜。次年6月，这一组织在巴黎郊区布罗尼森林正式诞生了。这便是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身。

旅欧共产主义组织一成立，就在勤工俭学学生中开展活动。邓小平此时在哈金森工厂做工，接触了一批先进分子，耳濡目染地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1922年夏天，邓小平加入了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与他一起举行入团宣誓的有蔡畅等人。从此，邓小平成为一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历尽70多年的岁月，无论是从事白色恐怖下的地下工作、在枪林弹雨中的战场，还是屡屡遭受革命队伍内错误路线的严重打击，邓小平都始终不渝地信守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誓言。

邓小平后来回忆说：“我在法国的五年零两个月期间，前后做工约四年左右（其余一年左右在党团机关工作）。从自己的劳动生活中，在先进国家的影响和帮助下，在法国工人运动的影响下，我的思想也开始变化，开始接触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参加一些中国人的和法国人的宣传共产主义的集会，有了参加革命

组织的要求和愿望。”

1923年6月11日，邓小平按照团组织的指示，来到巴黎专职从事旅欧团支部的工作，同时做一些临时性的杂工以解决生活问题。

邓小平到巴黎，正逢旅欧团组织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周恩来被推选为书记局书记，李富春负责宣传工作。19岁的邓小平在他们的直接领导下，成为旅欧团组织的对外理论刊物《少年》（后来易名为《赤光》）编辑部最年轻的成员。这是邓小平第一次直接参与革命工作，是他一生革命生涯的开始，从此，他正式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

《少年》编辑部设在巴黎戈德鲁瓦街17号小旅馆内周恩来的寝室。邓小平起初的工作是给刊物刻蜡板和印刷。他经常是白天做工，下工后即赶到编辑部。在狭小的房间里，周恩来将写好或修改好的稿件交给邓小平，邓小平把它一笔一画地刻写在蜡纸上，然后用一台简陋的印刷机印好，再装订起来。小屋的灯光时常彻夜不熄。在这里，他们一同忘我地工作着，迎来薄雾蒙蒙的黎明。经常是深夜工作完成后，邓小平就在房间打地铺和周恩来住在一起。周恩来十分喜欢这位年轻的伙伴，对精神饱满、谈吐直率、成熟沉稳、工作认真的邓小平，给予了兄长般的关心和爱护。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和帮助下，邓小平认真的工作态度和出色的工作成绩给同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家都称他是“油印博士”。

随着中国国内革命斗争形势的急速发展，国内急需大批干部，周恩来等即将回国工作。于是，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1924年7月13日至15日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邓小平作为委员和其他两位同志进入执行委员会的书记局。根据当时党的规定，担任旅欧共青团执行委员会的领导，就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邓小平迈进了他革命生涯的第二个阶段，时年他尚不足

20岁。

1925年春，邓小平作为中共旅欧支部的特派员，被派到里昂地区，负责领导那里的党团地方组织。同年，震惊世界的中国“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爆发，旅欧党团组织迅速行动起来，在帝国主义的“后院”开展斗争。6月21日，数百名旅欧华人分乘20多辆汽车，向位于巴黎市巴比伦街57号的中国驻法公使馆发起突然的示威行动，将驻法公使团团围住，要求他以驻法公使的名义，致电全国人民支持反帝运动，通牒法国政府从华撤军；代表驻法公使馆向旅欧华人道歉，保证以后切实保护华人利益和自由；捐款5000法郎，汇交上海援助罢工工人。在爱国群众的正义威慑下，中国驻法公使不得不一一照办。此事震动了全欧洲。中国共产党人在帝国主义的“后院”开展的一场反帝爱国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

法国政府气急败坏，派出大批警察，四处检查搜索，刮起了一场逮捕和驱逐的浪潮，旅欧党团在巴黎的核心组织受到严重的破坏。面对万分紧急的状况，邓小平“决然辞工到巴黎”，和傅钟等人商议组织临时执行委员会。

6月30日，临时执行委员会成立，邓小平任临时执行委员会书记局委员，接着又被任命为中国国民党驻法总支部监察委员会书记，肩负起在法国的国共两党合作开展革命运动的重任。临时执委会一成立，邓小平和他的战友们不顾当时十分险恶的政治环境，冒着随时被逮捕监禁的危险，顽强不屈地开展革命工作。法国警方也密切监视邓小平等人的活动，邓小平的名字频频在法国警方的密报档案上出现。

为了推动旅法华人的反帝爱国斗争，9月15日，中共旅欧支部召集了大规模的旅法华人反帝大会。会议群情激昂，声势浩大，旅法华人的爱国反帝斗争再次高涨。此时，年仅21岁的邓小平，已是旅欧党团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也成为法国警方秘密监

视、侦察旅法中国共产党人的主要目标之一。

为了工作、生活的需要，11月6日，邓小平进入雷诺汽车厂做工，被分配在钳工车间。这是邓小平法国生活的最后一站。

1926年1月8日清晨5点45分，一批法国警察闯进了卡斯德瓦大街3号的旅馆，直奔邓小平等人住过的5号客房。令警方恼火的是，在此之前几个小时，他们要逮捕的邓小平等人，在巴黎北火车站登上了列车，前往当时的革命圣地——苏联莫斯科。

从16岁到21岁，邓小平在法国生活了5年多，由一个怀抱工业救国理想的勤工俭学学生变成了有着坚定信仰的共产主义战士。在这段时间，他经历了艰难困苦，磨练了意志。他直接间接地参加了各种斗争，结识了周恩来、赵世炎、李富春等一大批同志，并在他们的帮助、支持下，从“油印博士”成长为中共旅欧支部的领导人，增长了政治才干和经验，成为年轻而出色的职业革命家。

莫斯科的洗礼

邓小平来到十月革命的故乡，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在那里较系统地学习了革命理论。

他在莫斯科时曾撰写过一份自传，其中写道：“我过去在西欧团体工作时，每每感到能力的不足，以致往往发生错误，因此我便早有来俄学习的决心。”“我能留俄一天，便要努力研究一天，务使自己对于共产主义有一个相当的认识。”“我来莫的时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坚决地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

中山大学坐落在莫斯科河西岸的瓦尔芬大街上，是一座规模相当大、四面环抱的三层楼房。从楼上朝下看，中间的院子就像个天井，那既是院子，又是篮球场，同学们常在那儿玩球。楼的

大门前是大花园，花园中有一条林阴小道。

中山大学要培养政治工作者和革命者，开设的课程有语言（俄语、英语、法语和德语）、历史（中国史、俄国史、东方和西方革命运动史）、哲学、政治经济学（主要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根据苏联有关著作编写的教材）、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的著作为主），还有军事科学和军事训练。

学校中有一个组，特别引人注目，这就是被称为“理论家小组”的第7组。这个小组里云集了当时在校的国共两党的重要学员。中共方面有邓小平、傅钟、李卓然等，国民党方面则有谷正纲、谷正鼎、邓文仪，还有汪精卫的侄儿和秘书、于右任的女婿屈武等等。因此，这个班很有名。

邓小平、傅钟和李卓然，3个人都是旅法共青团执委会的领导成员，都是在法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而且是具有一定革命斗争领导经验的共产党员，他们在思想和行动上都已成熟，履历也很引人注目。他们与国民党人士相处一个班组，在信仰上、观点上、见解上和阶级立场上都会很不相同，因此在各种问题上双方常常发生辩论，甚至于经常展开一定程度的斗争。这种斗争特别表现在与国民党右派势力的较量中，是和中国国内的政治斗争紧密相连的。

中山大学内中共党支部的一份《党员批评计划案》中，记载了1926年6月16日中共党组织对邓小平的评价。现摘录下来，以供更好地了解那个时期的邓小平。

姓名：邓希贤

俄文名：多佐罗夫

学生证号码：233

党的工作：本班党组书记

一切行动是否合于党员的身份：一切行动合于党员